

09

文史资料选辑

1981

第一辑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

文史资料选辑

一九八一年第一辑

(总第三十五辑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

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五月



八·一南昌起义的指挥所，原为江西大旅社



上海大学的临时校舍设在闸北青云路师寿坊

一九三五年十二月，上海文化界馬相伯等二百八十三人聯名發表救國宣言，成立文化界救國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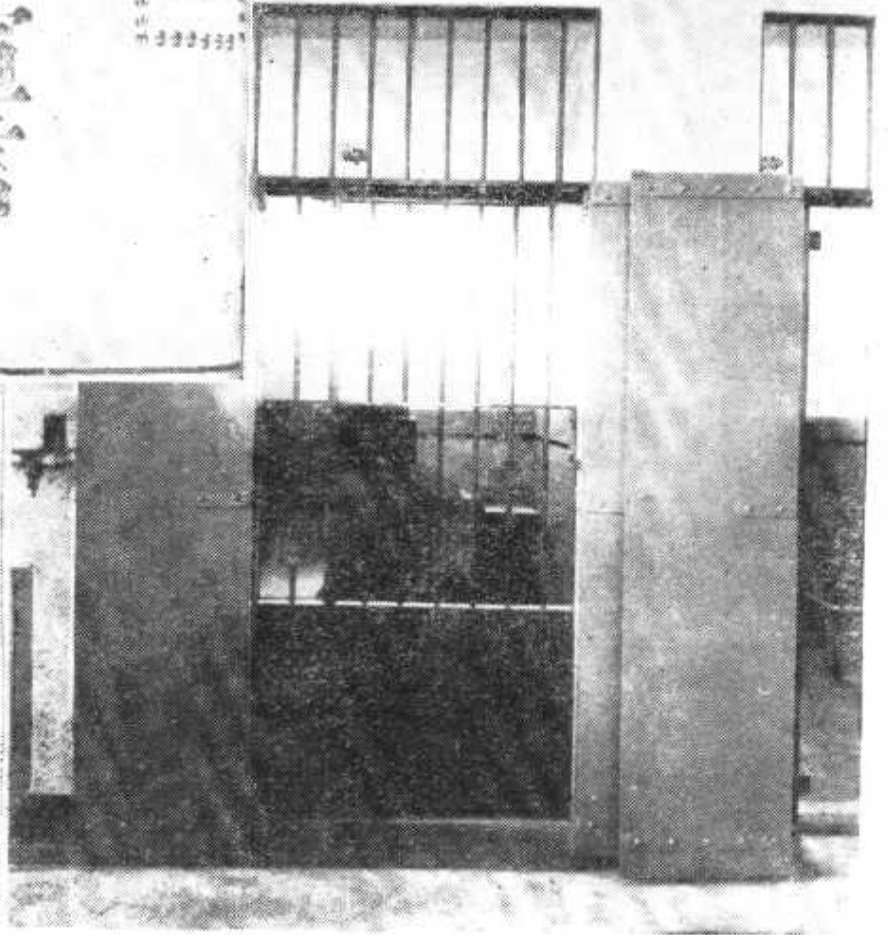
本市新聞

馬相伯等二百八十三人

聯名發表救國宣言

主張下最後最大之決心
堅持領土和主權之完整

馬相伯·王雲五·江恒源·沈鈞儒·周建人·周子同·孫寒冰·章乃器·陶行知·陳高
備·楊衛玉·楊應溥·鄒穎奮·廖茂如·壽穀成·鄭振鐸·蔣維喬·蔡正雅·錢基博·
蔡承新·諸青來等二百八十三人，昨聯名發表救國運動宣言，主張下最後最大的
決心，堅持領土和主權的完整，同時以上海文化界救國協會名義，致電中央政府，
及北平學生會。



上海西牢內部獄室

责任编辑 王有为
封面装帧 范一辛

文史资料选辑

1981年第一辑(总第三十五辑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

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5.125 插页 2 字数 112,000

1981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2,300

书号 11074·488 定价 (六) 0.55元

内部发行

目 录

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

- 八一起义前后靖任秋(1)
- 立三路线与行动委员会陈修良(11)
- 恽代英同志在安徽第四师范学校郑维辅(21)
- 四·一二事变中在上海的见闻童奎芳(26)
- 项英同志与上海二月罢工.....蒋自强、许维之(33)
- 上海西牢回忆李守宪(40)
- 参加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前后张承宗(47)
- 怀念刘长胜同志.....郑玉颜 遗著(67)
- 回忆刘长胜同志对地下交通员的培养教育...贺崇寅、姚明达(80)
- 地下交通线曹 达(90)
- 上海大学始末.....周启新 遗著(110)
- 《文萃丛刊》出版发行记沈峻坡(129)
- 忆殷夫张雪痕(139)
- 苏州东山起义席玉年、唐坚柏、让嘉谟(144)
- 上海舞潮案金 淦(152)

八一起义前后

靖 任 秋

用革命的武装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，这是我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特点。我参加革命队伍以后，一直过着军人生活。只是由于机缘不同，自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之后，党分配我长期隐蔽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国民党部队中做兵运工作，特别是做上层和接近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。

我的回忆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以后进黄埔军校写起。事隔几十年，记忆中可能有疏漏或错误之处，尚望同志们补充和订正。

一、进黄埔军校

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时，我在南京东南大学旁听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这年年底，党决定我进黄埔军官学校去学习，当时，组织上还介绍两个同志与我同行，一位是江西人姓熊，他原是黄埔第一期学生，学校派他到北方活动，任务完成后回校，另一位是台湾人，现在我已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了。一九二六年二月，我们一起从南京出发，由上海搭轮船到广州。那位台湾同志远离家乡，经济很困难，熊同志带的钱也不多，我身上也只有二、三十元，坐火车到上海，再住旅馆，买了船票，剩下的钱仅够在船上买饭吃。当时轮船

还不能直接到广州靠岸，只能先到黄埔，轮船停泊在珠江江心，还必需离轮船到民船上过夜，等第二天再雇小船到广州上岸。我们三人到达黄埔时已身无分文，处境困难。幸而同行的熊同志先找到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同志（他是周恩来同志离黄埔军校后的继任者），由他接济几元钱，使我们才得雇小船到广州，找到了总工会，凭组织上的介绍信，安排住进总工会。许多向往革命的青年历尽艰难曲折来投考黄埔军校，我们的遭遇也不例外。当时正是中山舰事件之后，首次国共合作由于蒋介石的阴谋破坏已出现裂痕，但在表面上仍保持两党合作局面，广州市面上还算安定。

在广东未统一以前，陈炯明还盘踞东江一带，广州附近基本上掌握在旧军阀杨希闵和刘震寰手里。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生毕业后，第二期与第一期相距时间不长，三期距二期毕业也仅有一年。那时以黄埔毕业生为基础，开始建立教导团，即教导团第一团和第二团，这是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队伍，成为讨伐陈炯明、平定东江的主力部队。回到广州，就发生杨、刘叛乱，教导团未经休整，即再鼓余勇，投入战斗，消灭了杨希闵和刘震寰的部队，从此声威大振。当时广东国民政府还有李济深、谭延闿、朱培德、程潜、李福林等部队，不过力量都不大。这两次战役对统一广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，教导团在两次战役中的光辉战绩，建立了黄埔军校的威望。

蒋介石以办黄埔军校起家，他在国民党内取得一天比一天高的地位，与教导团在统一广东时的贡献不可分，因为他是校长，学生的功绩都记在他的帐上。当时军队中的骨干多来自黄埔，而在历次战斗中表现比较突出的又大都是共产党员。蒋介石看到这点，就打起主意来，蓄意制造了中山舰事件。舰长李之龙是黄埔一期学生、共产党员，原是蒋介石比较信任的，提升也较快。因蒋经常住

在黄埔，平时中山舰往来于广州与黄埔之间，逢到调动，总是临时升火。一九二六年三月九日，中山舰奉到蒋介石的命令从广州调往黄埔，而蒋介石却诬称：这是“擅自移动，图谋不轨”，把责任推给共产党，并借此扣留了李之龙，故意夸大其事。以此为借口，他要求部队和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必须公开身份，并撤换重要岗位上的共产党员。对此，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居然表示同意，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。周恩来同志原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，也就在此时离开黄埔。

我到黄埔后，组织上决定不公开我的党员身份，当时党内部分同志已认识到公开身份这项决定是不正确的。例如，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公开以后，就不能在黄埔军校进行公开活动了。我进黄埔军校时，党员身份就不公开了。黄埔军校的教育过程分两个阶段：进校后首先当入伍生，实际上是锻炼我们过紧张、艰苦的军营生活。当时入伍生各团设在广州北郊白云山麓，靠近黄花岗和沙河镇。沙河镇上的沙河粉是很有名的，附近的山岳叫瘦狗岭，军校在那里搭了几排席棚，我们这批入伍生就在那里吃饭、睡觉、受训，过兵营生活。席棚里的床铺是用竹子搭成的双层床，布置得井井有条。入伍生阶段就是教育我们习惯于过军人生活，严肃、紧张，动作迅速、整齐。清早听了军号声，立即起床、穿衣，佩带枪支、子弹、水壶，只给十五分钟。吃饭也要听口令，不得先吃，十分或十五分钟以后，又喊“立正”，即使尚未吃完也不能再吃了。每天的日程安排得很紧凑，出操之前，先跑步半小时，枪、子弹、水壶都带在身上，广东天气热，要不了半小时，眉毛上的汗水几如雨滴，不喊“稍息”，谁也不准乱动。上午出操完毕，下午还要打野外，爬山时还要“冲锋”，列队回校时又要跑步。整天的操练，军衣都是汗湿的，连子弹

带也是湿的。吃饭前后，都是一身大汗，经常跳进沙河去洗澡。这样刻苦锻炼身体很不错，如今年岁大了，还深感这种锻炼的好处。

入伍生在沙河有两个团。我记得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是在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，誓师大会由教育长方鼎英主持，我们都列队参加。当时要在入伍生中抽选一个中队（等于一个连），进军校作为第四期学生，我也被抽去编入政治大队第四队，进校后不久就参加北伐。进军校后，党组织给我的任务是负责组织校内的国民党左派，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。这种斗争在黄埔军校一开始就存在着，国民党右派的根子是西山会议派，他们在军校组成了孙文主义学会，当时离校的黄埔学生也有个组织叫青年军人联合会，这是由我党领导同右派进行斗争的外围组织。此外，还有一个黄埔同学会，由蒋介石自任会长，这个组织对黄埔毕业生的安排和使用有很大权力。当时部队中的提升程序是这样：军校毕业，先当准尉见习，几个月后升少尉排长，再过几月提升中尉，最后当上尉连长。如果进黄埔同学会工作，一进去就是少校军阶。左、右两派在黄埔同学会内斗争极为激烈，蒋介石所信赖和依靠的始终是国民党右派。我记得当时黄埔同学会的秘书长曾扩情（四川人），就是蒋的亲信。中山舰事件以后，蒋介石要共产党员公开身份，停止活动，同时取消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两个组织，仅保留黄埔同学会这个组织，实际上孙文主义学会的活动更加猖狂。因此，我们当时和国民党右派斗争也涉及到在黄埔同学会中的斗争。

当时军校中的党员同志，虽然由于身份公开，活动受到限制，但他们与广大同学特别是与国民党左派仍保持广泛联系和影响。军校成立有特别党部，是由学生选举产生的，它对学生的领导工作有重要的作用。不久，我被选进特别党部监察委员会，以后我们逐

步取得了特别党部的全面领导权,活动范围开展到广州市,同时学校左右派的斗争也日益加剧。蒋介石在北伐进军江西以后,还不断有电报到学校,关心校内两派斗争的发展。

二、北伐到武汉

一九二六年十二月,我们政治大队第四队调出来,参加北伐,当时北伐军已到达武汉。我们一起从广州坐火车到韶关,再往北铁路还不通。出韶关,翻越九峰山,就到湖南衡阳。行军途中,路过几位同学的老家,备受亲切、热情的招待,至今记忆犹新。北伐军刚从广东出师湘、鄂两省时,纪律严明,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。记得过长沙时,我曾被邀至湖南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去演讲,那天我仍穿一件从广东出发的单军衣,里面只有一件棉线衫,在湖南的冬天穿这么一套衣服站在台上演讲,实在太冷了。听讲的人开始交头接耳,不久竟有人跑上台来,打断我的讲话,亲切地问我是否要再加件衣服?这种亲切关怀的情景,虽相隔几十年,至今还有深刻印象!可以看出,这是北伐战争初期的军民鱼水之情。

我们到武昌过旧历年。不久,广东国民政府迁到武汉。黄埔军校的全称是黄埔陆军军官学校,这时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,在武昌设立武汉分校,招收入伍生,编成入伍生一团、二团,还有一个女生队。

一九二七年初,我从军校毕业后,被留在军校政治部担任党务股长,负责特别党部工作。当时学校的政治气氛很热烈,蒋介石虽然名义上是校长,但一切由副校长恽代英主持,政治部主任周佛海,他当时还是共产党员,宁汉分裂后,才叛变逃往南京。总教官是施存统(后改名施复亮,当时也是共产党员),教务长是侯连瀛,虽

不是共产党员，但他倾向进步，是拥护党的。当然，学校中还有国民党右派，但他们已不是主导力量了。解放战争时期在淮海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军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，在军校时是国民党左派，由我介绍入党，一九三三年失去组织关系后，在国民党部队中当师长。有关他起义情况，当另文再述。

武汉分校的政治活动，也象在广州时那样发展到了学校以外。我们的社会关系经组织介绍，发展的面也是较宽的。例如，星期天我们经常到邓初民家开会，经常一齐开会的还有李汉俊等。黄埔同学会在武汉也成立了分会，我和曾钟圣同志（黄埔四期毕业，曾任《武汉日报》主编，在通南巴时遭张国焘杀害），共同负责黄埔同学会工作。蒋介石发动四·一二反革命政变，在上海屠杀工人，此时留守广东的李济深早已开始反共，他首先把矛头对准黄埔军校，我们不少同志甚至国民党左派都遇害牺牲。一部分人从广东逃到武汉，都由黄埔同学会负责收容并安排工作。

二次北伐，我们从武汉向河南进军，当时奉系军阀已占据河南，战斗很激烈，最后我们取得胜利，克复郑州。记得在武汉我们曾举行过追悼黄埔第一期同学蒋先云同志的大会，他是一位很好的团长，在河南战场上战死。当时宁汉关系紧张，汪精卫等已很动摇，而武汉兵力空虚，武汉卫戍部队只有叶挺一个团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湖南长沙发动马日事变，蒋介石策动夏斗寅部队进攻武汉，我们的部队正在二次北伐中，一时还不能从河南撤回，临时把武汉分校的学生编成两个团，加上一个学兵团编成一个独立师，由武汉分校教育长侯连瀛担任师长，归叶挺统一指挥，保卫武汉，讨伐叛军。队伍从武昌登车南下，只有两、三站，到土地堂即和叛军接触，一接触就把叛军许克祥击溃，跟踪追击到咸宁，叛军即向西南方向逃跑。

这里，咸宁县的县长也跑了，临时由叶挺部政治部主任陈兴霖（后改名陈子坚）当县长，叫我管公安局。叛军被打退以后，我们又回到武汉。武汉形势也有重大变化，宁汉破裂的形势已经形成。组织上认为我在武汉活动中过于暴露，通知我离开武汉，调到二十军贺龙所部，准备成立第三师，师长内定周逸群。我按组织上指示到了九江，这时东征部队也到九江一带。叶挺的二十四师建制归十一军，军长张发奎受汪精卫的指挥，他们要解决二十四师。叶挺据报后，即指挥部队迅速向南昌移动。当时南昌是第三军朱培德的地区，朱德同志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兼第三军教导团团长。

三、南昌起义之后

我到南昌后，组织上改变决定，叫我到二十四师政治部任组织科长，政治部住在南昌百花洲。没过两天，即举行著名的八一起义。这次起义事先经过周密的准备，经过短促的战斗，一夜之间，就把城内的敌人全部解决。我记得起义之日，上级命我带领政治部二十多人的武装力量，到百花洲出口处作自卫性防守，战斗很快就结束，我们在那里没有接火。在南昌缴获敌人的武器很多，由南昌向会昌、瑞金进军时，不分官兵都要多扛些枪支，我扛了两支步枪出发。八月的江西热得不得了，行军时汗流浹背，出南昌就是条沙河，过沙河时我们就热得走不动了。南昌起义部队向南开去，目的地是广东潮汕。当时想在广东建立革命基地，找个海口，争取得到苏联接济。

我们的部队刚出发，敌人就调动兵力，准备沿途截击。在会昌附近，与敌军钱大钧部一个师接触，一仗就把他们打垮，政治部清扫战场时，发现他们把家当都丢了，连钱大钧本人的马匹也被我们

俘获。到瑞金，我们刚住进城里，就受到敌军的包围，敌人盘踞在城外的小山上。我们把指挥所设在城墙上，可以看到敌军的活动。攻击令一下，我们即冲向城外小山，又把敌军打垮。离瑞金向福建移动，通过崇山峻岭，道路很坏，行军经古城到汀州，休息了两天。以后继续前进，在三河坝遭遇敌军的优势兵力，作战中我们两天连占三个阵地，最后发现敌军后续兵力很大，才决定撤退。

到潮州后，派陈子坚去当县长，我改任秘书，代理政治部主任。从潮州到三河坝，决定向海陆丰撤退。海陆丰是彭湃同志的家乡，有农民运动的基础。当时周恩来同志负责前敌军委，刘伯承同志负责参谋团工作。从三河坝撤到流沙，前敌军委在这里开会，我们稍作停留，下午三时，随军委指挥部一同出发。只走了十多里路，前面有小山挡路，突然发现敌情，就打响了。指挥部只有一个卫队连，想阻击敌人，势不可能，指挥部只能逐步后撤，让卫队连和敌人保持接触，幸而敌军没有追击。这一撤退又到了流沙村外，已是太阳快要落山。我见到贺老总，也只有几个卫兵，看到郭沫若在村外坐地。这时，天也快黑了，大家也就分散了。

当地农民受过农民运动的教育，对我们的态度很好，当天晚上由一个农民介绍我们住进一个祠堂，还为我们做了稀饭，第二天又派人送我们到汕头。当时敌军尚未到达，街上连警察都没有。又巧遇一位黄埔同学，他在校时是个中间派，一见面，他看我狼狈的样子就清楚了。幸而由他帮忙，为我买衣服和鞋子，找旅馆解决食宿问题，还给买了一张到上海的船票，我就这样从汕头到了上海。从汕头坐船赴上海时，船上见到很多熟人。陈赓、周逸群等都在这条船上，陈还和周逸群开了个玩笑，趁他不注意的时候，大喊周逸群如何如何，周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他。

进吴淞口到上海，正逢十月十日，看到两岸都挂起国民党的旗帜，心中痛恨难言，又想如遇到检查，很容易暴露，因为当时我们的脸都晒得黑黑的，如果脱去袜子，从两只爬山的脚上就会看出破绽。好在船到外滩，停在江心未靠岸，我们都是坐小舢板船上岸的。上岸后，先到我的一位老同学家暂住。不几天就遇到徐彬如，他是我的小同乡，在广州时我住黄埔军校，他读中山大学。找到他很快就跟组织取得了联系。

回顾八一起义，确有深刻的经验教训。南昌打响了第一枪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拿起武器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，点燃了武装斗争的烽火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次起义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。在此以前，我们虽然也参加部队工作，但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，甚至在关键时刻放弃了已经拿到手的军队领导权。南昌起义取得胜利之后，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，走农村包围城市，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，象毛泽东同志后来在井冈山所提出的那样。部队撤离南昌之后，一路上都打硬仗，虽然接连打了胜仗，可是消耗力量太大。其次，当时对兵源、弹药、给养的补充，也没有充分考虑，并没有明确认识到从敌人手中夺取武装，用以壮大自己的重要性。去潮汕找海口，找外援，当然也是需要的，但要分清主要和次要。

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份，组织上决定派我去苏联学习。可是动身的前一天接到通知，说组织决定在上海举行暴动，留我参加暴动，暂时不去苏联。那时上海属江苏省委领导，省委决定将在上海举行暴动，后来中央并未批准，暴动又中止。后来，我分配到上海总工会作工人军委工作，任务是教工人放枪和巷战，还是想等机会暴动。巷战我不懂，教放枪还可以，组织上还给我一支驳壳枪，我欣

然接受了这个任务。我和总工会平时接触不多，先租一间房子住下，组织上知道我的地方，有事派人跟我联系，只知道项英同志负责工会工作。当时和我一起留下的还有一位姓徐的同志，他是黄埔三期同学，南昌起义后，在贺龙部队当营长，南下进军途中受伤，到上海养好了伤，组织上就派他到无锡去指挥农民暴动。他很快就回来了，见面时告诉我，那里群众没有发动起来，参加暴动的没有几个人，就是他放了一枪。我在总工会工作，接触的工人群众也不多，可见群众基础很差，举行暴动是带有盲目性的。大革命失败以后，大家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感到愤恨，要反抗，要打倒他，但具体怎样干，却缺少缜密的研究和正确的方法，加上白色恐怖严重，党遭受了很大的损失。

后来我调到闸北区委工作。大革命失败后，上海地下党力量不大，同时，上海的政治环境已经很恶劣，白色恐怖也日趋严重。我在上海总工会和闸北区委工作的时间都不长，到一九二八年春天，被调到中央军委工作，这是周恩来同志亲自负责领导的，有时可以听到恩来同志做形势报告。有一次，他在报告中谈到，可能情况变坏，找不着组织，要各自为战。这次报告给我的印象很深，更其重要的是时隔不久，组织上派我去武汉工作，实践这个“各自为战”的方针。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阶段，就此结束。

（陈霞飞、陆诒整理）